

· 性别视角下的萧红专题研究 ·

现代都市中的女性成长

——论萧红创作中的哈尔滨

金 钢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8)

摘 要: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哈尔滨是一座交缠着“现代化”“都市化”与民族苦难的新兴大都市。在这座城市里, 萧红接受了新潮教育, 获得了知识启蒙, 也是在这座城市, 萧红初次大量接触、亲身经历社会底层的种种痛苦与悲凉; 这里是她逃亡的起点, 也是她不断回望、反思之地。对萧红来说, 哈尔滨这座城市无论是在作品内还是在作品外, 都充满了复杂、深沉的含义。

关键词: 萧红; 哈尔滨; 启蒙; 底层

中图分类号: I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838(2017)04-0060-05

萧红出生、成长在一片五方杂处的地域, 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其故乡小镇呼兰与国际化大都市哈尔滨隔江相望, 从少女时代起, 萧红便时时感受着对岸大都市的诱惑。在从小城姑娘张乃莹到作家萧红的蜕变过程中, 哈尔滨这座城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启蒙

在萧红的现实生活与文学世界中, 有两处地方尤为重要: 一处是她出生的小镇呼兰, 另一处是她逃亡的起点哈尔滨。她表现东北乡村生活的作品, 如《生死场》《呼兰河传》等, 都与呼兰的生活有关。至于涉及东北都市生活的作品, 如《跋涉》《商市街》以及后期的一些散文, 所写的也正是哈尔滨。

哈尔滨的历史源远流长, 是一座从来没有过城墙的城市。早在 22000 年前, 旧石器时代晚期,

这里就已经有人类活动。哈尔滨是金、清两代王朝的发祥地。公元 1115 年, 金朝在上京(哈尔滨阿城区)建都。到 19 世纪末, 哈尔滨已出现村屯数十个, 居民约 3 万人, 交通、贸易、人口等经济因素开始膨胀, 为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此时, 沙俄帝国主义根据 1896 年签订的《中俄密约》, 攫取了在中国吉林和黑龙江两省修筑铁路的权利, 哈尔滨作为中东铁路的中心, 迅速发展起来。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和哈尔滨城区的建设, 大量的俄国侨民、欧美流亡者以及国内闯关东者涌入这座城市, 到 1920 年代, 哈尔滨已成为东北的经济文化中心。

按照拉铁摩尔的说法“哈尔滨和大连是现代化的大城市, 它的潜力在北京、南京之上, 甚至可以和上海并驾齐驱。”^[1] 由于是横贯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的转运重镇, 哈尔滨成了中国东北最容

收稿日期: 2017-04-15

作者简介: 金刚(1978—), 男,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易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城市,而来自关内的新潮思想文化也沿着铁路迅速传入了这里。1920年秋,中国记者、作家瞿秋白在赴苏联途中在哈尔滨逗留了一个半月。他对那里的环境作过如下描述“哈尔滨久已是俄国人的商埠,中国和俄国的商业显然分出两个区域。道里道外市面大不相同。道外是中国人的,道里是俄国人的……俄国人住在这里,像自己家里一样。”^[2]。1927~1928年,诗人冯至到哈尔滨第一中学任教。他在创作于哈尔滨的叙事诗《北游》中,把这座华洋杂处的城市称作“一个病的地方”,一个“不东不西的地方”,一座“阴沉沉的都市”,那里聚集着“犹太的银行,希腊的酒馆,日本的浪人,白俄的妓院……还有中国的市俗”^[3]。此时的哈尔滨,交缠着“现代化”“都市化”与民族苦难的纠结,构成了复杂而又特殊的地域背景。

通过简要的历史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哈尔滨这座城市是此地域人类社会权力和历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最大限度的汇聚体。哈尔滨的城市环境可以展现此地域人类文明的种种重要含义,近现代以来此地域的一幕幕栩栩如生的历史事件和戏剧性场面,映现出一个崭新的而又有自主意识的人类社会形态。这样的社会形态对一位敏慧的小镇姑娘将会产生的冲击之大可想而知。1927年8月,萧红来到了哈尔滨这座国际化大都市。那年她考进了哈尔滨的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现为哈尔滨第七中学)。在这里,萧红很快就受到了新思想、新观念、新生活方式的洗礼。

“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催生的学生运动也在哈尔滨如火如荼地展开,萧红在散文《一条铁路底完成》和《一九二九年底愚昧》中描述了她参加学生运动的情景。《一条铁路底完成》记叙了1928年底发生在哈尔滨的一次反对日本在东北修筑铁路的学生运动,文中萧红描写运动发展到后段,关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完成吉敦路”这件事情的本身已经被人们忘记了,只呼喊着“打倒警察”。“在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我相信我绝对没有见过,但是警察我是见过的,于是我就嚷着‘打倒警察,打倒警察!’”^{[4] (P1073)}

对一位刚从家庭温室走出来的女孩而言,萧红并不全然了解日本侵占东北的情况,而警察对学生运动的打击是直观的,学生们呐喊着奔走、受伤、流血,打倒的对象由日本帝国主义变成了警察,似乎对斗争的结果并不在意,运动就是一切。

《一九二九年底愚昧》则写了萧红参与“中东路事件”学生运动的情形。苏联依据1924年《中俄条约》及《奉俄条约》,据有从满洲里到长春一线的中东铁路及其沿线的相关设施,并进驻上千名铁路和商务人员,以维护其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1929年5月27日,东北地方当局以苏方在哈尔滨总领事馆举行远东党员大会,“宣传赤化”为由,命令哈尔滨特警处前往搜查,逮捕了39人,同时封闭了中东路苏联职工联合会。在文章中,萧红重温了当年的爱国热情。她写道“‘打苏联,打苏联……’这话就是这么简单,在我觉得十分不够,想要添上一个‘帝国主义’吧,但是从学联会发下来的就没有这一个口号。那么,苏联为什么就应该打呢?又不是帝国主义。”^{[4] (P1076)}这表现出萧红对政治斗争的困惑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关于苏联或者说沙皇俄国,虽然离萧红的生长地很接近,但在少女的心中对这个临近国度的了解并不多,记忆里较深的印象是小时候母亲“买羌贴”(即沙俄的纸币),为了这项投资,父亲骂母亲“受穷等不到天亮”,父亲的观点显然更为理性“皇党和穷党是俄国的事情,谁胜谁败我们怎能够知道!”而祖父和母亲则认为“那穷党啊!那是胡子头,马粪蛋不进粪缸,走到哪儿不也还是个臭?”^{[4] (P1077)}这反映出乡间浓重的皇权思想。当“穷党”上台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母亲逃到萧红的房间来,抱着女儿的小枕头哭了一夜。有了这样的故事,萧红在这次学生运动中,尽管做得非常努力,却“觉得我是没有中心思想”。而她们的女校后来公开地领着学生们把苏联的一个子弟学校给占过来,当作了学生宿舍,这些都使得萧红对学生运动的正义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虽然这两次学生运动没有产生任何实际的效果,但对萧红以及那些参加运动的青年学生们而言,却是毕生难忘的大事,对他们的一生有着深远的影响。在第一女中学习期间,萧红的文学

艺术素养有了很大的提升。“她特别倾心于当时流行的‘浪漫派’作品,尤其是描述旧社会不平的小说以及当时西方文学的翻译作品都很受她欢迎。由于她接触到不少西方作品,因此她对‘社会文学’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5]鲁迅、茅盾等新文学主将的作品也为萧红所喜爱,这些作品都丰富了萧红的思想。经过三年的中学生活,萧红已不再是起初那个懵懂无知的小镇女孩了。

二、寻路

关于萧红离家出走的原因,近年来陆续发表了一些资料和评论,众说不一。有的说是为了逃婚,有的说是因为参加了哈尔滨的爱国学生运动而触犯了父命,有的说是为了继续上学。不妨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看,那就是因为萧红的思想和行为全面违反了父权社会为“女儿”这一角色所规定的形象特征。

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探讨过新式女性走出家庭的后果,“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6]萧红所面临的正是如何寻找离家之后的出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这对一个没有经济来源的少女来说无疑是一个难题。当她怀着身孕被未婚夫王恩甲遗弃在道外东兴顺旅馆时,她的人生几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境地。

如果说是萧军拯救了萧红的话,不如说是萧红自己挽救了自己。在濒临绝境之时,她给《国际协报》文艺副刊编辑老裴写了一封信。信中诉说了自己身为孕妇,因债务缠身,被软禁在东兴顺旅馆的情状,希望报界主持正义,帮助她脱离险境。“一封求援信,居然还写上‘我们都是中国人’之类的话,对老裴加以责难。这种近于不通情理的作为,在老裴看来,不但不生气,反而有敬服之意。他在家说起此事,对妻子说‘在中国人里,还没有碰见过敢于质问我的人呢!这个女的还真是个有胆子的人!’”^[7]萧红以其大胆和文艺才能为自己在绝境中冲出了一条路,一条文学

之路。对萧红来说,如果文学仅仅是一门艺术,那么将同所有奢侈品一样,很可能与她无缘,但文学还具有工具性,这就为她打通了生活、职业和实现理想的道路,在家庭之外,开辟了一个可容她活动的空间。这空间是如此宽广、博大而又深邃,让她甘心情愿地投身其中。

到1930年代初期,哈尔滨的文艺活动已相当活跃。哈尔滨长期被俄苏势力所控制,俄人文化素养较高,创办了大量的报纸杂志,而日本的侵略势力又很少顾及到这里,这些都为哈尔滨都市文艺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发展空间。在这种情况下,1932年春,中共满洲省委从日伪统治严密的沈阳迁到日伪政权尚不稳固的哈尔滨,哈尔滨成了东北抗日反满斗争的中心。在罗烽、金剑啸、舒群等地下党员的带领下,一批爱国进步文化工作者利用敌伪和民营报刊,建立起文艺宣传阵地,暴露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反映人民生活的疾苦。在这样的夹缝处境中,萧红这个出走的“娜拉”进入左翼阵营也就势在必然。她以其对民间社会的观照和感同身受的生命体验,同萧军一道成为1930年代哈尔滨文学的主将。

东北沦陷时期的小说家和文学理论家王秋莹在《满洲新文学的足迹》中曾说“如果以奉天与哈尔滨的文学比较,那么哈尔滨的文学确实高出于奉天。这北地的作家们,都能刻实的不夸诞的,去忠实写作。在刊物一方面,如《国际协报》的副刊与刘莉主编的《文艺》周刊,《哈尔滨公报》的《公田》,《五日画报》的附刊……都是很好的刊物。在这些刊物里,我们时常可以找出几篇好的作品来。在当时最杰出的作家当推三郎夫妇,自从他们的小说集《跋涉》出版了以后,不但在北满,而且轰动了整个满洲文坛,受到了读者们潮水般的好评。……作者的每篇创作绝不是一些想象出来的故事,我们看出作者是在现实油锅里熬炼过的青年,自有他生活的经验,所以从作者笔尖滑下来的,是人生奋斗血汗的点滴。”^[8]

在现实世界与文学世界的对比中,萧红的生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极。在现实世界里,她受尽了磨难,但在文学世界中,她却释放出

生命所拥有的全部活力和潜能,她的早悟和敏感熠熠生辉。这两者的反差是否仅仅因为她笔尖滑下的经过了现实油锅的熬炼?而现实生活又如何变成了油锅?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向历史追问:历史为“五四”以来觉醒的女性究竟提供了多长、多宽的路?历史对此沉默不语,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只是萧红这沉静的乡村女儿被时代唤醒之后彷徨寻路,却发现置身于沉沉黑夜而前途茫茫。黑夜里只有一点闪烁的烛火,那便是文学这一人类的精神之火,这是萧红命运路途中的一线微光。她朝着这生命的微光奔去,在十年的困苦漂泊岁月里写出了一百万字的作品,把她的生命能量燃烧到了极致。她所经历的苦痛与寂寞都成为文字,流传至今。从她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窥见作家的心路历程和那个时代的诸多特征。

萧红的作品如《生死场》《呼兰河传》或其他短篇小说,虽然都有那种“注册商标”式的寂寞,但却没有在《商市街》等表现哈尔滨生活的作品中所流露的慌乱和不安。当切断与家族的联系之后,萧红在哈尔滨所表现出的迷失、寻路、重新找到社会身份的过程,内蕴极多。她在《跋涉》《商市街》等作品里所透露出的失落与迷惘,不是生活贫困和感情纠缠可以简单概括的。

三、底层挣扎

20世纪以来,中国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就是城市的兴起,大量人口从乡间的农业生活移入现代化的城市。甚至有论者认为,“到21世纪末,人类将成为一个完全生活在城市里的物种”^[9]。这种人口的流动伴随着各种苦难、革命和战争,新进入城市的人们常常会陷入困境、遭到排挤、心生怨怼。萧红便是现代中国较早由乡村进入城市者中的一员。

哈尔滨是萧红由乡村过渡到城市的中转站,代表的是她生命中的转折期,亦是她对自己、对世界最感迷惑和无所依傍的阶段——身份未明、位置未定。1930年代的哈尔滨,有“远东莫斯科”“东方小巴黎”等美誉,甚至与上海齐名,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外国资金的涌入让哈尔滨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但在这国际都市的另一

面,大批本土的和闯关东到哈尔滨谋生的中国人,成为都市底层最贫苦的人群,贫富悬殊、阶级不平等的现象甚为明显。1930年代的哈尔滨在表面的都市繁华之下,隐藏着沉重复杂的都市病态。萧红的文字对都市的繁华只是浮光掠影,公园、电影院、火车站、中央大街这些哈尔滨的标志性地点在萧红的作品里用墨很少。她的笔直插入都市的底层。“什么夜,什么市街,全是阴沟,我们滚在沟中”,而“在一家电影院门前,我终于跌倒了”^{[4] (P1007)}。面对现代化的电影院,萧红从没有进去观影,只是在它门前跌伤了膝盖。身为都市底层的穷苦人,萧红不过是繁华都市的“局外人”。

区别于鲁迅那一代自觉启蒙的精英知识分子,萧红更认同底层民众的苦难,甚至崇拜他们坚韧的生命力。在现代中国的作家中,很少有人像萧红一样饱受饥寒交迫的苦痛,遭到从肉体到精神刑罚般的凌辱。面对宿命的人生苦难,在底层民众顽强的生命力中汲取生存的精神力量,是萧红不断挣扎前行的动力源泉;抵抗外来暴力的时代主题,建立历史主体的必然要求,也是萧红认同底层民众顽强精神的重要原因。《小偷、车夫和老头》一篇写出了城市底层民众的三种状态,偷样子、运样子和锯样子三组人物的对比表现出了贫苦民众的复杂性:偷窃者“贪多不厌”,偷了两块木样之后还想偷更多,若不是车夫提醒,恐怕年轻的、缺乏社会经验的二萧会损失更多;车夫把木样运到收完车钱之后,大方地向雇主索要了几块木样,却并不说自己“贪多不厌”;而锯样子的老者在完成工作之后,主动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并不多要一分工钱,更是要把吃面包的钱扣除,锯样子老者的诚实与感恩正应和了萧红对爱 and 温暖的憧憬与追求。城市底层的贫穷生活可以使人贪婪、邪恶,也可以使人诚实、善良,人性的复杂于此可见一斑。

如果说《呼兰河传》等乡村书写是萧红的童年记忆,那么哈尔滨的都市生活则象征着童年世界的一去不返。《度日》一篇中,变身为主婦的萧红知道“这不是孩子时候了,是在过日子,开始过日子。”“他出去找职业,我在家里烧饭,我在家里等他。火炉台,我开始围着它转走起来。每天

吃饭,睡觉,愁柴愁米……”^{[4] [P997]} 这样的简单重复表现出了家庭主妇寂寞、无聊的生活。萧红在《借》中写到,当她为了生计去“女子中学”借钱时,过往“温馨的记忆”又浮现在眼前,这是她对这座城市最初的记忆,“我忘不了这一切啊!管它是温馨的,是痛苦的,我忘不了这一切啊!我在那楼上,正是我有着青春的时候”^{[4] [P1006]}。尽管在她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年纪并不大,但身心却都饱经沧桑。她并没有借到钱,忍着腹痛往回走,“一个行人没有遇见”,或许是表达了城市茫茫人海中却格外孤独的心境。她走到了哈尔滨现代城市的重要象征——火车站前,“大时钟在暗红色的空中发着光,火车的汽笛轰鸣着冰寒的空气,电车、汽车、马车、人力车,车站前忙着这一切”^{[4] [P1007]}。这繁忙的都市景象只是更加衬托了萧红的落寞,如此多种交通工具在面前,她却只能忍着肚痛一步一步挨着走向自己的小家。《商市街》中萧红数度流离迁徙,最终的结局仍然是准备再次逃往他方。萧红无家可归的处境,既指向真实世界,又暗示着成长中自我精神求索的彷徨与苦痛。《商市街》继续流浪的结局,无论在作品内或作品外,都充满象征意味。

哈尔滨这座城市是萧红接受新潮教育、获得知识启蒙的地方,也是萧红初次大量接触、亲身

经历社会底层种种苦痛、悲凉的地方;是她逃亡的起点,也是她不断回望、反思之地。如今,她的家乡呼兰小镇已成为不断扩张的哈尔滨的一个区,多座大桥飞架松花江上,通往松花江北岸的地铁也将建成,萧红故居已成为哈尔滨的一处重要的文化景观,只是不知萧红一直所针对的“人类的愚昧”^{[4] [P460]}在这座北方大都市中还存留多少。

参考文献:

- [1] 拉铁摩尔. 满洲: 争斗的泉源[A]. 葛浩文. 萧红新传[M]. 香港: 三联书店, 1989. 12.
- [2] 瞿秋白. 饿乡纪程[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33.
- [3] 冯至. 冯至诗选[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63.
- [4] 萧红. 萧红全集[M].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1991.
- [5] 葛浩文. 萧红新传[M]. 香港: 三联书店, 1989. 14.
- [6] 鲁迅. 鲁迅全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166.
- [7] 林贤治. 漂泊者萧红[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45.
- [8] 彭放. 黑龙江文学通史·第二卷[M].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2. 176.
- [9] [加拿大]道格·桑德斯. 落脚城市[M]. 陈信宏,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1.

Women's Growth in Modern City: On the Harbin in Xiao Hong's Fiction

JIN Gang

(Heilongjiang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arbin 150018,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20s and 1930s, Harbin was an emerging metropolis that intertwined by “modern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national suffering. In this city, Xiao Hong received trendy education and got access to enlightening knowledge. Also in this city, Xiao Hong witnessed and experienced the pain and agony of the lowest class of the society. That w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her escape, but also the land that she constantly recalled and reflected upon. In Xiao Hong's fiction, Harbin was full of complex, deep meaning both on the interior and the exterior.

Key words: Xiao Hong; Harbin; enlightenment; the bottom of society

(责任编辑 赵莉萍)